责编： 林娜　E-mail:studytimes4@126.com　Tel:010—62806240

◆政策与管理

经贸先导　经略中路　打造文明复兴共同体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思考

□杨正位　周宝根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新一轮扩大开放的战略举措。“一带一路”的题中之义是打通向西向南开放的通道，是国家战略层面上的布局。如何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简称“丝路带”）战略构想变为现实，选择正确的路线图十分关键。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要走务实合作之路，以经贸合作为先导，以丝绸中路为重点，以合力共推为手段，以“文明复兴共同体”为号召，打造立体、开放、联通“四亚三洲”的现代丝绸之路，建设世界最长、最有潜力的亚欧非经济大走廊。

找准功能定位，从历史兴衰中汲取智慧

丝路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标志，它的繁荣与阻绝与中华民族的兴衰息息相关。当前中华民族正迎来伟大复兴，建设“一带一路”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战略价值。鉴古知今，古代丝路的经验教训，为当代丝路建设提供了重要启示。

古丝路作为经济全球化的早期版本，被誉为全球最重要的商贸大动脉，其实质是服务于亚欧之间的商贸和物流大通道，是当时的世界性贸易通道，具有五大功能。

商贸之路。丝路首先是商品贸易走廊，双方交易的主要是当时的高档或奢侈品，体现了各自的比较优势，有商业利润才有长距离贸易的动力，也才可持续。郑和下西洋缺乏民间商贸，耗损国力而难以为继。可见，丝路不是政治之路，没有经贸基础，单纯的政治文化交往不可能持久。

开放之路。丝路繁荣是在中国最开放的汉唐与宋元，那时的中国拥有开放的气度、胸怀与自信。丝路形成也是各国自主参与、主动开放的世界合力。

盛世之路。丝路兴衰成为中原王朝盛衰的寒暑表，丝绸等成为中国强盛的象征，“中国兴，则丝路兴”。

和平之路。中国没有借此对外侵略和扩张，体现古代中国王道政治的理想。我国推动的早期全球化是商品自由贸易，西方推动的近代全球化是士兵为商品开路。

文明之路。丝路是世界文明史上的“大运河”，将古代世界几大灿烂辉煌的文明—中华、印度、埃及、巴比伦、波斯、阿拉伯及希腊罗马等文明联结起来，相互借鉴，交相辉映，是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

可见，丝路首先是商道，有商流和人流，有市场需求，符合经济规律，丝路才会水到渠成，才能持久繁荣。发展经贸、追求效益是丝路繁荣的核心，加强沟通、维护和平是丝路发展的保障，文化交流、文明共荣是丝路往来的结果。

找准重点领域，以经贸合作为先导

建好丝路带需要立足国情世情，中国特色与世界大势有机结合，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结合，打造出国际水平的现代丝路。发展经贸合作是沿途各国的共同愿望，经贸先导是阻力最小、推进更顺的优先领域。

顺应世界大势的需要。当前，世界经济版图深刻调整，亚欧经济一体化势在必行，多国提出新丝路构想以赢得主动。我国作为古丝路的关键国家，更应加快调整全球战略，布局丝路战略空间和中国的“新兴市场”，其中经贸合作将发挥核心作用。

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需要。扩大向西开放利于西部由开放“边缘”变“前沿”、“后队”变“前锋”，打造东西呼应、海陆并进的全方位开放格局，并促进填平中亚及我国西部这一发展“凹陷带”，缩小发展差距，构建西部安全屏障。

凝聚各国共识、减少阻力的需要。经贸合作“零和游戏”少，更能互利共赢，是各方最迫切的现实需要，是国际关系的“压舱石”“推进器”，加之基本不涉及敏感议题，更容易化解疑虑、达成共识、取得突破。

保证丝路有效益、可持续的需要。有路没货拉、没人走，路就不会繁荣。渝新欧等列车综合时速低于 30 公里，原因不仅在于通关不便，更在于货源不足。如果时速能提到 80 公里左右，则耗时将从 18 天降至 5~6 天，减少 2/3 以上，对海运的替代能力就会迅速提升。

打造世界第三大贸易中心的需要。沿途贸易潜力很大，陆路可能部分替代海路，形成继大西洋贸易中心、太平洋贸易中心之后的亚欧贸易中心。我国宜发挥陆海兼具、“中央之国”的地缘优势，推动建设这一中心。

丝路带建设是浩大的国际合作工程，非一国之事，非一国之力，更非一日之功。我国宜把握好原则：一是坚持长短结合，保持战略耐心，既要趁热打铁，在经贸合作、文化旅游等方面尽快取得快速突破和“早期收获”，也要循序渐进，积小胜为大胜。二是坚持一国一策，用好现有机制。域内各国发展差异较大，部分国家之间存在纷争，建立新机制的阻力大。带内现有机制较为成熟，上合组织、俄白哈关税同盟等机制有效运转，应立足现有机制。三是坚持市场运作，企业主体。经贸合作深化到一定程度，道路联通、货币流通等需求就会相应增大，丝路带也就自然形成。要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政府引导、市场决定与企业主体结合，确保丝路的可持续性。

经贸先导要有实的举措：以自贸区建设和贸易便利化为抓手，大力提升贸易水平；以经贸园区和重大项目为抓手，加强投资合作；以创新边境合作方式为抓手，打造西部开放高地；以“两优”贷款和援外等为抓手，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以经贸平台与多双边舞台为抓手，推动务实合作；以软硬两方面互联互通为抓手，加强基础保障；以顶层设计和多层次沟通为抓手，提升“五通”的服务保障能力。

找准优先路径，善于国际合作借力

当代丝路的前景吸引了世界目光，主导权和制高点之争激烈，成为大国的角力场。1980 年代以来，联合国、亚行、国际道路联盟等国际机构，美国、俄罗斯、欧盟、日本、印度及部分中亚、西亚国家，共提出了 10 多个丝路计划。这些计划圈圈相套、互有交叉，范围上的最大公约数在中亚，内容上的交集在经贸合作与道路建设。

与美新丝路计划、俄欧亚联盟等相比，我国丝路带的优势明显。理念优势：比美俄包容性更强，地域最开阔，受惠人口最多，且不谋求地区主导权与势力范围，不损害第三者利益。地缘优势：位于丝路东端，与沿路国家经贸关系密切，更容易成为受益者。传统优势：古丝路深入人心，受益者众，由我国来号召现代丝路更易为大家接受。资金优势：经济体量大，资金相对充裕，支持力度可以增大。前景优势：我国民族复兴步伐加快，带动力上升，沿路国家响应较为积极。

要减少丝路带的风险与阻力，我宜放宽眼界：从古丝路看今丝路，开放的丝路带对我国更有利；从参与全球化经验看，我国虽不主导但被看成最大受益者。我国作为丝路重要的利益攸关方和最大经济体，有地缘优势加经济后盾，不管丝路如何建、谁建成，我国都可能是最终受益者。这样，主导权不那么重要，主动权才重要，得实惠更重要。我国可主动倡导“共商、共推、共赢”的合作建设理念，从主导思维到结果思维，学会“借鸡生蛋”，多搞“合资”。

我国作为复兴大国，建设国际性的丝路带，应发扬古丝路的开放包容精神，从中华观念转向世界观念，扮演开放、合作、建设性的角色，培育国际上的道义感召力。要深化与联合国、亚行、国际道路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合作，择机联合融资。对于丝路上其他合作抱战略合作态度，善于借船出海。

找准主要线路，重点经略中路

路线选择关乎主导权与制高点。丝路带涉及近 50 国，国别情况复杂，路线、方式选择多样。如何分清主次，重点突破，需要立足长远，从民族复兴的战略需要来综合考量。

丝路带可分五条线路。由北向南依次为：第一、二条即亚欧大陆桥、新亚欧大陆桥北线，可称为北路。第三条经中亚—伊朗—土耳其—欧洲（非洲），为古丝路的主干线，是中路。第四、五条即中巴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南路。综合比较五条线路，中路的优势相当明显。

沿途国家积极性高。中路沿途国与我国关系良好，与我国倡议不谋而合，合作愿望强烈。如土耳其“丝路情结”重，认为自己是丝路中心国；伊朗本世纪初提出过“新丝路”概念；中亚哈萨克等国总体积极。对这些国家的热情我国宜善加引导，争取成为丝路带建设的创始合作伙伴。



利益纽带越来越紧。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很强，是多国数一数二的贸易投资伙伴。且中路需“准轨”的线路最短，比北线少 2750 公里，可节省成本。中路的人流、物流比北线多，更有市场前景。

长远战略价值最为突出。中路处于“一带一路”的交汇处，是陆路与海路互济的关键线路，可直通印度洋、波斯湾和中东。中路经过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带，是避免“马六甲困局”的核心替代线路。中路贯通几大古代文明，带动力、感染力最强。

同时，南线中第 4 线的喀喇昆仑公路一年有 6~9 个月停运，修铁路代价极高，安全隐患大；第 5 线要突破印中互信不易，现在仅停留在概念上。中路有南北两翼作掩护，将是丝路的轴心。中路将打通我国西部生命线，结合南路三箭齐发印度洋与波斯湾，盘活中东与西亚，是一步大棋、活棋与先手棋。鉴于中线的战略价值，我国宜“五路共进，重在中路”。

找准突破口，打造“文明复兴共同体”

打通中路要有操作性抓手，增强沿路各国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沿线文明古国多，包括中华文明、印度文明、埃及文明、两河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等几大文明系统，“文明复兴”是其最大公约数之一。这些文明都有辉煌的昨天，有列强欺侮的悲情，有被边缘化的伤痛，有西方价值与本国价值的冲突，有加快现代化的愿望，有相似的发展问题与现代化难题，有民族复兴的强烈共鸣。经济的互补性、文化地位的相似性和复兴的现实性，使达成共识的可能性增大。

中路沿线涉及的文明同属广义的“东方文明”，我国可借丝路带建设机遇，倡导几大古代文明的交流、互鉴、融合与现代复兴，共同打造“文明复兴共同体”（CRC，Civilization Rejuvenation Community），发扬古丝路的文明间和平交往精神，用行动创造出“文明和谐论”，盘活我国与众多国家的关系，增强我国话语权与主动权。

为经略中路、打造这一共同体，让古丝路文明精神再生，可率先设立“文明复兴与现代化”论坛。借鉴中巴经济走廊做法，先从论坛入手，然后回到经贸合作的主题，与中路相关文明古国开展文明复兴的交流对话，时机成熟时推出“文明复兴共同体”宣言，提出“CRC 经贸伙伴”概念并加强可行性研究，实现与丝路带的全面衔接。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有效发挥央行宏观审慎监管作用

□郭　威

金融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邓小平指出，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金融”这步棋走活了，“经济”全盘棋也就活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在完善金融市场体系部分开门见山提出，要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金融的全面开放意味着利率市场化、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等金融创新的持续和深化，与此同时，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是金融风险测度与控制的重要制度保障，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我国对外负债管理、资本流动频繁以及互联网金融等金融问题的出现，不断完善和加强金融监管制度将是金融改革领域一个恒久的主题。

从国际实践来看，回顾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欧美等发达经济国家在宏观调控方面，虽然采取的工具、调控力度和时机有所不同，但各方共同认为，建立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是维持金融稳定的未来趋向。中央银行作为维持金融稳定的重要金融机构，如何发挥其在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应有的重要作用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由此，各国先后构建以中央银行为核心的宏观审慎监管体系，推行防范系统性风险为目标的金融监管改革措施。在国际金融监管理念转变的冲击下，经过长达两年的调研和征求意见，2012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下称《规划》），《规划》将“建立健全金融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放在了首要位置，要求进一步构建和完善逆周期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在此次《决定》中又明确指出，要建立健全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外债和资本流动管理体系。

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同样适用于我国金融体系，理由有三。首先，我国目前的分业监管体系使得三大监管机构各司其职，在监管地位中处于平行位置，难以形成统一的监管政策，经常产生重复监管、监管真空和监管套利等问题。其次，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需要宏观审慎监管体系实时监控来自国际金融市场的风险。中央银行作为唯一的货币发行机构在人民币发行规模、适时出入规模以及外国持有规模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同时，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往往是利率市场化，这也要求中央银行继续完善利率调控框架和利率传导机制。再次，信托公司、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以及各类金融机构各类理财等形式的影子银行长期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近年来的“隐形和野蛮生长”对现有的监管规则和标准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因此，有效发挥我国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体系中的作用应是题中之意，成为我们必须进一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明确中央银行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责的法律主体地位。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根据目前的《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的职责是“在国务院领导下，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可以看到，并没有明确在法律层面赋予人民银行执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因此，人民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目标上并不明确。同时，也缺乏有效的工具和手段，即便有，但可能也会由于“师出无名”而受到阻碍。比如，宏观审慎监管要求监管主体对杠杆比率、存贷款增长、资产价格变动、金融体系流动性等宏观因素要予以密切关注并允许央行在此基础上开发或采取一些工具和手段，从而有效监控系统性风险。

完善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等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完善两者协调机制要求正确看待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的关系。以中央银行为主导的宏观审慎监管和以专业监管机构为主导的微观审慎监管要实现全方位的协调，互为补充。专业监管机构在实施微观审慎监管时，应处于中央银行的宏观审慎监管大范围之下，并整体服务于宏观审慎监管，为其实施监管提供基础支撑。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就中央银行负责宏观审慎监管与专业监管机构负责微观审慎监管的分工合作关系问题进行严格的制定，难以避免监管重合、监管真空和监管不明等问题。只有建立起微观审慎和宏观审慎两方面的协调机制，才能有效维护金融稳定。

建立央行与各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充分而准确的数据支持是央行履行宏观审慎监管职责的基础保障，唯有如此，才能及时发现危机，从而更加迅速地作出反应并制定科学决策。为此，需要建立央行与其他宏观审慎监管制度内其他监管机构间的信息共享机制。从中央银行来说，建立信息共享责任约束制度，明确共享原则、标准、内容、途径以及承担责任等，根据各个监管机构和宏观调控部门提供的数据尽快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具有指标生成和分析功能的数据库；从各监管机构来说，要积极配合中央银行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具有义务按中央银行要求及时提供现场和非现场的监管数据和资料，促进宏观审慎监管信息和微观审慎监管信息的及时、全面沟通与信息共享。通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保证信息共享的及时性、有效性和充足性，保证中央银行准确评估风险并采取宏观审慎监管措施。

处理好货币政策与监管政策的关系问题。宏观审慎监管要与以防范、化解危机和稳定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有机统一，两者是互相配合，相辅相成的关系。一方面，将宏观审慎监管职能划分给中央银行，有助于其制定货币政策时考虑到货币政策对微观金融运行主体的杠杆率、风险偏好与预期等方面的潜在影响，同时为中央银行运用逆周期调节工具提供更为广阔的思路和空间；另一方面，有效的货币政策是宏观审慎监管的必要补充，但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政策对宏观经济影响传导的时间滞后性，货币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局部经济失衡，严重时甚至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宏观审慎监管客观上需要与以稳定经济和防范危机为目标的货币政策配合。

◆发展之路

互联网对企业战略思维的颠覆

□本报记者　林　娜

3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邀请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做客“思危大讲堂”。“没有成功的企业，只有时代的企业。”这是张瑞敏讲座的题目。他认为，做企业不要只想做到成功的那一天，而是要永远追求成功，因为所谓成功只不过是踏上了时代的节拍，如果你赶上了这个时代你就能发展起来。海尔就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没有海尔的今天。而企业不可能永远地踏准时代的节拍，很多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互联网时代企业的寿命也越来越短，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快。真正跟上这个时代很难，因为思维定式非常难以改变，比如：摩托罗拉被诺基亚取代，就是因为摩托罗拉属于模拟时代，诺基亚很快被苹果取代，因为苹果手机是进入互联网的终端而不只是一个通讯工具，它踏准了互联网时代的脉搏。

互联网时代下，传统企业如何踏准节拍，有人认为，传统企业在互联网时代颠覆自己非常困难，就好比从山巅下到谷底后，再爬另一座山，把自己完全颠覆掉。张瑞敏认为，最难的还是在于“破立”之间——是把旧的破掉，再把新的立起来，还是破立并举，这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而适时的策略应是破立并举，边破边立，创新体制机制。

传统企业的战略导向思维是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所谓规模经济就是把企业做得越来越大，所谓范围经济就是多元化。这种思维就是企业要做大做强，做大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规模经济，做强就是范围经济，要在这个行业里头规模是最大，谁也没法和我竞争，我做这个行业多元化之后别人也难以替代，所以我就守住了这个地方。

现在互联网时代，企业的导向要从规模与范围思维向平台思维转变，平台成了互联网时代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这缘于网络使企业和最终消费者之间零距离，从信息不对称变成对称，不但对称而且关系改变了，原来信息的主动权在企业手里，而现在信息主动权到了用户手里，用户可以在网上随时点击是要你还是不要你。因此张瑞敏认为，新型企业的发展方向应是构建一个由企业、员工、用户与合作者组成的多方合作平台。

平台是一个开放的生态系统，不同于传统企业不管多大多强都是封闭有边界的。平台的框架就是快速配置资源的框架，用户和商家之间可以非常快的沟通，同时用户可以自交互，企业竞争就由原来的做大做强变成了现在我要做平台，谁平台做得最大谁就是做得最好。如在网络平台上，实现同样的销售额，不需要众多的实体店，只不过需要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所有的交互双方可以无障碍地交互。

基于互联网平台思维，海尔做了“人单合一”双赢模式的探索。“人”即为员工，“单”即是市场目标，并不是狭义的订单，而是广义的用户需求。“人单合一”即让员工与用户融为一体。而“双赢”则体现为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同时体现出自身的价值。员工成为了自主创新的主体，由此形成了企业与员工之间关系的一个新格局。即由原来员工听企业的，现在变成员工听用户的、企业听员工的为用户创新的方案。“人单合一”双赢的本质是：我的用户我创造，我的增值我分享。也就是说，员工有权根据市场的变化自主决策，员工有权根据为用户创造的价值自己决定收入。

原来员工是在企业内部，用户在外部，新的模式使二者合在一起，在一个平台上。让员工在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通过搭建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的机制平台，推进员工自主经营，使每个人都是自己的 CEO，并组成直面市场的自组织即自主经营体。同时，新模式把过去远离用户的研发、营销、制造等职能全部推近用户，让他们直接取得用户的反馈，让决策者（而非以前的经销商）走向顾客。“人单合一”的概念达到了动态的持续优化以及端到端闭环优化。动态持续优化是指能够不断地收集用户最新的需求，从而立刻反馈到各个部门进行优化；而端到端的概念则为一端“用户不满意”，另一端为“用户满意”，每个员工有责任并有权直接采取反应措施，把用户的负面体验立刻解决掉。

企业战略决定组织结构，组织结构服务于企业战略。为适应平台思维企业战略，张瑞敏提出并在海尔做了企业组织结构演变的探索，从原来的“正三角组织”，到“倒三角组织”，到“自主经营体”、再到“利共体平台”，最后演化成现在的“企业生态圈”。海尔在组织观念演化方面的实践是，员工去“领导”中心，人人成为创客；用户去“企业”中心，成为体验主导；企业进行“轻足迹管理”。为更好地适应网络时代，现阶段海尔探索的目标是“三无三化”：“三无”即企业无边界、管理无领导、供应链无尺度；“三化”即企业平台化、员工创客化、用户个性化。